谜一样的文字——西夏文

王培培

西夏(1038—1227)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封建帝国,西夏文就是这个帝国的文字,西夏人称之为“番书”,它所记录的语言也称“番语”、“党项语”或“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西夏文是西夏统治者为凸显其民族特色而特意创制,具体创制过程各种史书记载不尽相同。例如有“景宗元昊创制说”(曾巩《隆平集》)、“元昊之徒遇乞创制说”(沈括《梦溪笔谈》)、“元昊自制野利仁荣演绎说”(《宋史·夏国传》)和“太祖德明创制说”(《辽史·西夏传》)。现在一般都根据《宋史·夏国传》所记“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认为西夏文为夏景宗李元昊创制,其大臣野利仁荣演绎而成,时为西夏大庆元年(1036)。

西夏文在历史上一共行用了四百多年,现存资料中年代最早的是1072年的《瓜州监军司文书》,最晚的是河北保定明弘治十五年(1502)西夏文经幢——“胜相幢”。此后,从明代中叶到清末,这种文字被人们遗忘了长达三百多年之久,成了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西夏文的再次发现是在19世纪初,发现者是清代学者张澍。张澍于嘉庆甲子年(1804)在甘肃武威偶然看到了夏汉文合璧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上面有汉文年款“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天祐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的另一面所刻文字为西夏国字。然而这种文字的考订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间中外学者都付出了诸多

努力。西夏文的真正解读得益于20世纪初黑水城文献的发现。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我国的内蒙古西北部找到了黑水城遗址，发掘出了数量巨大的西夏文献。其中有多种西夏文字典，最重要的一部便是《番汉合时掌中珠》。它是一部1190年刊印、由党项人骨勒茂才编纂的夏汉双语双解字书。自此，西夏文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过国内外学者一个世纪的共同努力，如今西夏文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天书”，识读西夏文资料也不再成为一个难题，一些基本的西夏文献已经逐步被人们解读出来了。

据出土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同音》、《文海宝韵》、《同音文海宝韵合编》、《三才杂字》、《纂要》、《同义》、《五音切韵》、《新集碎金置掌文》等九种西夏文“字书”，西夏字的总数约六千，书写形式有楷书、行书、草书和篆书。人们评价西夏字形体方正，笔画繁复，古人甚至说它“类符篆”。从形体上看，它与汉字很相像，即所谓“远看都是汉字，近看却一个也不认识”。虽然西夏文字的创制并没有采用任何一个现成的汉字或者汉字偏旁，而是利用汉字的笔画来重新造字，但是它仍然仿照了汉字的构字原则。传统的汉字有“六书”之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西夏的构字法主要借鉴了其中的会意和形声两种。

西夏字可以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独体字多记录常用词，一般笔画较少，其形体已经不能再分解，它们有很强的再生功能，是组成文字的基础。如果再细分，这些独体字又可分为表意的独体字和表音的独体字。值得一提的是，西夏有少量独体字蕴藏了一些象形意义，就是用笔画将事物的轮廓或特征勾画出来。此外还有表音的独体字，通常用于借词、地名、人名或佛经真言等等。它们也常常是构成新字的一种成分，并且通常新字的读音与原独体字的读音都有联系。

数量众多的合体字构成了西夏字的主干，这种字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字拼合而成的，组字时可以用一个字的全部，也可以只用一部分。合体字又可分为会意字、形声字、反切字等。会意字就是组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意义的形体，表现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方法。西夏新组会意字的意义往往不是原来几个文字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其中有时还会掺杂民族文化的因素。会意字可以

将两个相同的形体排列在一起组成新字，还可以组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形体的字造出新字，新字强调二字意义的组合。西夏形声字虽然没有会意字多，但也是构字的一个主要方法。西夏字仿照汉字而来，自然会受到汉字形声造字法的影响，也就是把表示事物类别的部分和表明字音的部分相组合以造字。西夏反切字的一个字由两个字组合而成，这两个字正好是新字的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也就是说，新字的读音恰好是这两个字中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合而成的。这是西夏人从汉译佛经里学到的一种造字方法。反切字在西夏字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多用于姓氏、地名或真言等。西夏文字还有一种特殊形式，人们习惯称作“互换字”，顾名思义，就是把一个字中的两个部位互相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新字往往与原字在意义上有密切的联系。

文字创制完成后，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它的推广和应用。政府设立了类似中原翰林院的番学院和汉学院，其中番学院由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官吏。已经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献表明，西夏文的使用有过它的黄金时代。就目前所知，西夏文文献的种类非常多，其中有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契约账目、文学著作、历史文献、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文的典籍和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从使用地区来看，不仅西夏的腹地宁夏和甘肃河西走廊出土了很多西夏文文物，而且在其他地方——东至内蒙古巴林右旗、陕西北部，西至敦煌，北至内蒙古额济纳旗，南至兰州附近，都有西夏文献存留的痕迹。在西夏境内，西夏文是与汉、藏等文字同时并用的，夏仁宗时期所立的黑水建桥碑为汉藏合璧石碑，这些都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特色。西夏文字的创制和使用不但促进了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当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所获的西夏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共有五百多种，近九千个编号。继科兹洛夫之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14年也到达了黑水城，掘得的西夏文献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的伯希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也得到了少量西夏文献，分别收藏在法国国家博物馆和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此外，日本、印度也都藏有一些从中国流失的西夏文献。20世纪以来，在我国的甘肃、宁夏、

内蒙古等地也有西夏文献相继出土，现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或各地的文物管理部门。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佛教著作占90%以上。世俗文献主要包括译自汉文的典籍，著名的有《论语全解》、《孟子》、《孝经传》、《十二国史》、《贞观政要》、《孙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类林》等，西夏本土撰述则有皇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家训类著作《新集慈孝传》，诗歌集和谚语集、各种字典、韵书、童蒙读本、医学著作，以及数不胜数的社会文书。这些文献可以弥补历史典籍的不足，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对西夏文字的研究开端于19世纪末。随着西夏文字典不断地公布于世，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对西夏文字产生了兴趣。俄国学者捷足先登，他们在西夏文字学、语音学、语法学、词源学以及西夏文献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日本学者则使用了标准的汉文字学套路，对西夏字的组字要素、构成方法及西夏人造字的思维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中国学者则由于长期使用方块汉字的缘故，其目光自然集中在方块西夏字的构成上。早期的中国学者都在尝试着采用传统的汉字学方法来分析归纳西夏字的“偏旁”和“部首”，以求说明西夏字的构成在形、音、义三方面的理据。20世纪60年代末，俄国学者公布了西夏字书《文海》，我国学者依照《文海》提供的字形说解对西夏字的构造进行了再次讨论。80年代以后，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存世西夏文献得到了不止一次的解读，这些成果不但使人们看到了西夏文化的辉煌，而且还为中古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资料。近十几年来，世界各地收藏的西夏文献已经开始在中国相继出版，大量的文献阅读使得学者们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这种貌似繁难的文字当中很可能隐含着某些极其简单的规律，只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它而已。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相信，通过各国学者的努力，最终破解西夏文字之谜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